本版编辑：李少军
E-mail：t6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6049

谈书访学

编者按：今年11月20日，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，为纪念胡耀邦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》（第四版），作者沈宝祥以亲历者的身份，回顾、梳理、剖析了30多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。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首发于《理论动态》。沈宝祥教授曾是理论动态组成员，后担任《理论动态》主编和《学习时报》高级顾问。为再现胡耀邦创办《理论动态》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些历史片段，记者专访了沈宝祥教授。

胡耀邦创办和领导下的《理论动态》

——访《理论动态》原主编、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

□ 本报记者　程冠军　李少军

记者：沈教授您好，您的专著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》（第四版）不久前与读者见面了，请问这次修订再版的亮点有哪些？

沈宝祥：这是本书第四次出版。主要亮点有三方面：一是这本书终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阵地——中共中央党校所属的出版社出版，也了却了我一桩心愿。前三版都是在其他出版社出版的。二是对全书做了新的增订，专门增加了一章，介绍了讨论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（草案）的情况，介绍了从提出反“左”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。三是李岚清同志专门为本书篆刻的印章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印在了封面上，我的老领导吴江同志生前为本书的题字也放入了书中。

记者：您在书中详细记述了胡耀邦同志领导创办《理论动态》的过程，您能谈一下胡耀邦同志当初决定创办《理论动态》的情况吗？

沈宝祥：关于创办《理论动态》，时任胡耀邦秘书的陈维仁（中央党校原副校长）有一段回忆。1986年6月11日，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党校刊物工作座谈会上说，“当时，耀邦同志考虑到，学校仅让干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，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，必须写文章，用评论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。所以，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。开学前不久，耀邦同志找了十多个人座谈，他专门讲了一次按劳分配的问题，一共讲了十条，讲得很有新意，实际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议论而发的。讲完以后整理了记录，经过他自己修改后，题为《谈谈按劳分配》，先送给几位老同志征求意见。他是基于这样考虑，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以后，你光让他们读那个经典著作选读本还不行，还要给他们讲讲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。当时，社会上正在争论要不要搞奖金、发奖金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，这本来是工厂里面的一个实际问题，但同时又是一个理论问题”。“中央党校历来都是讲理论联系实际的，但明确地提出要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的，是耀邦同志。他发表了那篇《谈谈按劳分配》的讲话以后，就同我们议论，是不是找几个人来办一个刊物，一期登一篇文章，不要凑好多篇才来发，三天就出一期。他说，现在新问题多得很，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。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。”“当时，耀邦同志觉得社会上有些刊物过于脱离实际，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，特别是一些政治理论刊物，号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，实际上书卷气很重。他说，我们办《理论动态》就是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。”这些意思胡耀邦也对我们反复讲过。以上是胡耀邦创办《理论动态》最初的一些想法。

记者：当时，胡耀邦同志为《理论动态》制定了什么样的办刊方针？

沈宝祥：当时，有几点是明确的，就是这个刊物要有针对性，要适应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，要查明马恩对一些基本原理、重要观点的原意和原话，来澄清被“四人帮”搞乱了、颠倒了的理论问题。总之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说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。刊物要适应领导干部的需要，每期一篇，文章要精短。但是，正如胡耀邦所说，办这样一个刊物没有经验，还是试办，要在实践中不断完满起来。《理论动态》的办刊方针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明确的。

我依据自己的笔记粗略统计，从1977年6月4日开第一次会议，宣布创办《理论动态》的决定起，到1978年4月底这一段时间，共11个月，胡耀邦在此期间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19次。此外，有时他还派秘书到理论动态组传达他的意见，他召集的一些其他会议也让理论动态组同志参加，在这些会议上，他也常常讲到《理论动态》。在会上，除了研究选题外，胡耀邦和大家一起，不断地研究读者的反映，包括某些冷嘲热讽，总结办刊经验。他反复地向我们阐述办刊的方针和要求。

1977年9月10日，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全体同志开会，并吸收有关同志参加。他对《理论动态》创办两个月作了小结，讲了四条重要的意见。第一，对两个月的刊物作估计。他说，办了两个月了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。我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，有了一定的影响，要有信心。第二，这个刊物有一定的目的，一定的篇幅、作用、编法，有它自己的特点，主要在理论上，又牵涉到一些思想问题，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发表一点看法，发表一点意见，不要在预定的目的、作用、篇幅以外去寻求什么。他要求大家坚持办刊方针。他还要求大家努力提高质量。他说，只要两期质量一般，威信马上就会降下来。不要炒冷饭，搞一般化的东西。怎样保证质量？就是要对当前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介绍。第三，要熟悉马克思主义观点，又要观察当前思想理论动态，把这两者高度结合起来。一方面，要经常翻阅马列著作，另一方面，要经常观察当前有什么重大的思想理论动向，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。第四，文风要注意摆事实，讲道理。

1977年10月12日下午，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（吸收了有关同志参加）上，总结了10月7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把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》一文的经验。他说，这篇东西的优点、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敢于接触实际，阐述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，用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精神，用马列主义的观点、毛泽东思想的观点，谈了党的一个重要问题，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，就越彻底，越能掌握群众，越能变成物质力量，不是绕开问题走，不是模棱两可。他指出，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，给了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信心，不要怕，形势不同了。他提出，《理论动态》文章要短小精悍，是匕首、投枪、手榴弹，要办好，要精雕细刻。

记者：据了解，胡耀邦同志离开中央党校之后依然继续关心和领导《理论动态》，对此您有什么印象？

沈宝祥：1977年12月10日，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（仍然兼任中央党校领导职务）。12月17日晚，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。他说，我后天到组织部上班，你们要满怀信心地提高、前进，我还和大家共命运，继续管《理论动态》，由吴江具体抓。在《理论动态》刚创办时，他说管两个月。现在，已经5个月过去了，他还是要继续管。这说明，他对这个刊物有了感情，而且，充分认识到这个小刊物所起的重要作用、所发生的影响。他向大家明确提出，《理论动态》“应该继续前进，不要后退；应该提高，不能降低”。他还提出，要做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，每天用这个要求来激励自己。鉴于他的工作重点要转向中央组织部，大家有一种惜别之情。

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以后，包括到党中央工作以后，依然继续关心和领导《理论动态》，他同理论动态组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，就是写批语。他为《理论动态》写了许多批语，有的是针对某一文稿的，有的是讲《理论动态》办刊方针的。

在一篇送审稿上，胡耀邦批示：《理论动态》切不可绕开当前全党性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矛盾走。如果绕开，质量要立即降低。这一点，请你们千万注意警惕。在另一篇稿上，他批示：中央决心搞经济改革。为了改革，必须首先破除思想僵化。因此，我支持一切改革的积极言论。在一个材料上，胡耀邦批示：现在在一小部分人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，要进行教育（不提批判），这是一个大事。要努力写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文来。还有好几次，胡耀邦对不符合《理论动态》方针要求的文稿，写了尖锐批评的批语。在送审的一篇哲学论文稿上，他写了这样的一条批语：文字庞杂，学究气太重。我对这篇东西估价不高。

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反复讲，要把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、理论是非、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。他的另一个说法是，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，把弄偏了的东西纠正过来，把混淆的东西加以澄清。这是当时我们研究选题、讨论稿件时的一个基本要求。在编写研究第九、十、十一次路线斗争提要时，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，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、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他指导办《理论动态》的两条原则。

胡耀邦提出的上述原则和他制定的办刊方针，为1978年5月10日《理论动态》第60期发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。

记者：您还记得胡耀邦最后一次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时的情形吗？在这次会上，胡耀邦同志主要讲了哪些问题？

沈宝祥：胡耀邦最后一次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，是1981年9月29日。这时，他已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。这次会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开的。胡耀邦作了长篇讲话。他提出，还是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阐述，加以思想的、理论的阐述。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、没弄清楚的、模糊的、急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加以条理的、理论性的、有说服力的说明。他要求大家密切地注意实际情况，注意思想动向。在文风上，他提出要反对假、大、空、套、长。他认为，写文章的根本方法，要从个别到一般、从具体到抽象、从地上到天上，而不应从抽象到抽象、从概念到概念、从天上到天上。胡耀邦的这次讲话实际是对《理论动态》创办四年来的总结，同时也对以后进一步办好这个刊物寄予希望。

胡耀邦同志对《理论动态》充满了感情。有一次，胡耀邦同志与理论动态组的同志谈话时深情地说：“我死后，要写上一笔，生前办过《理论动态》。”



书名：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》
作者：沈宝祥 著
出版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2015年6月

名篇欣赏

知安危　能逸劳　明利害

——读苏轼《教战守策》

□ 周　可

北宋嘉佑2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年仅22岁的苏轼参加礼部考试，高中进士。四年后，苏轼应制科试，取为最高等，并授官职，一时间声名显赫。然而，仕途得意没有冲淡他对王朝命运的忧虑。北宋自仁宗以来，已呈现贫弱景象。外有西夏契丹两国，虎视眈眈，边患严重；内多骄奢淫逸之徒，安于一隅，不思进取。年轻的苏轼忧心忡忡，直言进谏，向宋仁宗呈上二十五道策论。《教战守策》是其中广为人知的名篇。今天，品读此篇，仍让我们折服于青年苏轼的忧患意识、远见卓识和出色文采。

文章开篇即以迅雷之势亮出自己的观点：“夫当今生民之患，果安在哉？在于知安而不知危，能逸而不能劳。此其患不见于今，而将见于他日。今不为之计，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。”苏轼所问可谓尖锐犀利，其所答亦是斩钉截铁，如同迎头棒喝，振聋发聩。读者及此，难免疑窦丛生，又不乏兴趣盎然，按捺不住想探一究竟。为什么“生民之患”在于“知安而不知危，能逸而不能劳”呢？它又怎么会酿成“不可救”之祸难呢？苏轼随后娓娓道来，条分缕析，如抽丝剥茧般解答了读者的疑问。

以史为鉴，可知得失

苏轼对比了先王与后世截然相反的安民做法。先王之时，天下太平，但先王深知兵战不可弃。于是，在农闲时节，组织民众操练武艺，演习军事，使民众熟练掌握钟鼓旌旗等器械装备，从而无惧于杀戮


苏轼

争斗。这样，即便出现盗贼侵掠，民众也不至于惊慌溃乱。到了后世，君王听从一些迂腐儒生的建议，“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，天下既定，则卷甲而藏之”。数年后，不仅军备松弛，而且百姓安于逸乐。一旦有盗贼侵扰，民众就惊慌失措，不战而走。苏轼特别提到，这方面的殷鉴并不久远。唐代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可谓升平盛世。然而，民众坐享太平，沉迷游乐，堕失刚勇，萎靡不振，以至于安禄山作乱，百姓遭殃，天下分裂，唐室式微。北宋王朝的安宁祥和，与开元天宝年间的歌舞升平，何其相似。如果不以史为鉴，一味贪图安逸，势必重蹈覆辙。

探究事理，明辨安危

进而，苏轼以个人身体比喻天下大势，探究生民安危之道。养身之道，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，大不相同。王公贵人虑患备至，乘舆穿裘，然而养之太过，稍不留意，则寒暑侵入，故常苦于疾病缠身；农夫小民终生勤苦，不避风雨，因而筋骨强劲，寒暑不侵。苏轼总结道：“是以善养身者，使之能逸而能劳；步趋动作，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；然后可以刚健强力，涉险而不伤。”养身尚且如此，治世亦不能外。如今承平之日既久，民众骄惰脆弱，俨如妇人儿童，畏惧谈兵论战；士大夫也担心兵事扰民，不敢言兵。岂不知身体养之过甚则多病，民众养于安逸则无能，长此以往，危在旦夕。正如孟子有云，生于忧患，而死于安乐也。

审时度势，切中时弊

接着，苏轼笔锋一转，切入时局：当今之世，虽无战事之险，但难绝战事之忧。仁宗时期的短暂安宁，是以向西夏和契丹输款纳物百万计而求得的。但是，“奉之者有限，而求之者无厌，此其势必至于战”。苏轼通观北宋与西夏、契丹对峙局势，断言北宋与西、北两国之间必有战事。战事既然不可避免，发动民众，积极备战，便是当前要务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文章至此，从远及近，由缓到急，史论结合，时势相连，已经把中心论点阐发得淋漓尽致。一言以概之：“天下之民，知安而不知危，能逸而不能劳，此臣所谓大患也。”不过，作者并不急于搁笔，而是遵循策论的体例，向当政者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。具体而言，要使士大夫尊尚武勇，讲习兵法，庶人操练行阵之法，役民掌握击刺之术；年末举行检阅，按胜负行赏罚；推行一段时间后，实行“军法从事”。这样教民战守之策，就能够“使平民皆习于兵，彼知有所敌”，哪怕会惊动民众，引发抱怨，但是能迅速发动训练有素的民众应对战事，其益处显而易见。不仅如此，这一策略还可以遏制各地驻军的骄横和奸谋，有助于整治边防。

纵览全篇，《教战守策》一文布局严谨，层次分明，语言流畅晓白，说理透彻清晰，行文波澜迭起。苏轼围绕安危逸劳之间的关系，辨明利害，提出教民战守、全民习兵的主张，确实是鞭辟入里，对症下药。今天我们再读此文，既惊叹于一代文豪的优美文笔，又感慨于封建士大夫的远见卓识。

链　接

北宋王朝到了仁宗赵祯时期，在承平的帷幕背后，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日益迅速地深刻化、尖锐化。内部农民起义不断；外部西夏、辽不时冒犯。统治阶层当中一些较能正视现实、深谋远虑的人，便不断提出革新政治以自救的主张与要求。以范仲淹为首的“庆历新政”就是这种趋势下的产物。年轻的苏轼，很快地也投身于这个浪潮中了。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25岁的苏轼应“制科”考试时所作的《进策》二十五篇（包括《策略》五篇、《策别》十七篇、《策断》三篇），分析了当时北宋王朝经济、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危机四伏的形势，提出了除弊兴利的要求，发表了革故鼎新的见解。《教战守策》是《策别》中的一篇，主要针对北宋王朝当时对外政策的弊端和武备废弛、民不知兵、兵不能战的现状，从边防安全着想、为国家长治久安大计，高瞻远瞩地指出“知安而不知危，能逸而不能劳”的危险，旨在论述他教民于平时练习战守之事，以防边患的意见。

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

——习近平《在颁发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”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》（2015年9月2日）

【讲话原文】

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”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，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。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，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，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。

【出处】

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
势分三足鼎，业复五铢钱。
得相能开国，生儿不象贤。
凄凉蜀故妓，来舞魏宫前。

——（唐）刘禹锡《蜀先主庙》

【释义】

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”为刘禹锡五律《蜀先主庙》的首联。蜀先主即汉昭烈帝刘备，蜀先主庙在夔州（今重庆奉节县东）白帝山上。刘禹锡曾于公元821—824年间任夔州刺史，该诗当作于此时。这首咏史之作赞扬了刘备的功业，慨叹蜀汉事业所继非人，总结了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。

“天地英雄”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：“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）。刘禹锡添一“气”字，便有了庙堂气象。“天地”两字横括广袤地域，极言“英雄气”充塞六合，至大无垠；“千秋”两字纵贯悠悠古今，极写“英雄气”万古长存，永垂不朽。“尚凛然”三字虽然平平道出，却涵咏不尽，意味无穷：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，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，便自不待言了。

郁达夫在《怀鲁迅》一文中曾说：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有了伟大的人物，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仰的国家，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告诉我们，“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，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。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，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”。这些抗战英雄，既包括共产党将领杨靖宇、赵尚志、左权、彭雪枫，也包括国民党将领佟麟阁、赵登禹、张自忠、戴安澜；既包括八路军“狼牙山五壮士”、新四军“刘老庄连”、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，也包括国民党军的“八百壮士”，等等。他们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，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，其“英雄气”将充塞寰宇，千秋凛然。

（杨立新）

用典释义